

王柯, 《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 1930年代至1940年代》^{*}
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3。332頁。

王大剛^{**}

1930和1940年代, 新疆爆發的兩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 不僅與當時中國國內形勢有密切關係, 而且對二戰後遠東國際政治格局的形成, 乃至當今的新疆民族關係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 1930年代至1940年代》(以下簡稱《東突運動》)一書力圖從新疆社會結構、民族革命思想起源與質變、運動內部權力結構以及當時的國際政治等四個視角, 探討東突運動的歷史(頁 xv-xvi)。

全書分作十章, 前兩章是背景介紹。作者認為, 新疆建省前, 清朝統治者將維吾爾人與漢族民眾隔離開來, 同時又嚴防維吾爾人脫離清帝國, 維吾爾社會「變成了一個既不是『中華』又不完全是『穆罕默德的烏瑪(Umma, 即『伊斯蘭共同體』)』的存在」(頁14)。

進入民國時期, 在楊增新、金樹仁統治下, 新疆存在著「地域社會與民族社會」的雙重結構。作者把漢族官僚體系(縣以上)稱作「地域社會」, 而把鄉以下(包括獨立於行政系統以外負責管理水利的「米拉甫」和「克裡克巴什」)的系統, 歸屬於「民族社會」(頁40-41)。

在這種雙重社會結構下, 十九世紀末在喀什地區民族社會萌發了「近代維

^{*} 此文寫作得到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前所長紀大椿教授的幫助, 特此鳴謝。文責筆者自負。
^{**} 1960-1970年代曾在新疆居住, 1980-1990年代在澳洲多所大學任教, 2010年代任昆士蘭大學人文學部客座研究員, 現已退休。

吾爾文化啓蒙運動」，到 1920 年代，這個運動發展到了高峰。作者認為，正是這個運動，為後來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準備了條件（頁 29-32）。「東突厥斯坦」這一外來地理名稱，直到 1930 年代第一次東突運動爆發後，才被維吾爾知識分子普遍接受。

1930 年代初，英國支持了喀什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日本在推行大蒙滿計畫的同時，也將觸角伸向新疆。英日在新疆的活動引起蘇聯的警惕。盛世才聲稱馬仲英背後有日本的支持，從而得到蘇聯的幫助，確立了自己在新疆的統治地位。喀什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存在不到三個月，即在這次盛馬之爭中被剷除。

該書的第三、四兩章主要是分析盛世才政權結構的「雙重性」及其對盛世才民族政策的影響。當時與盛世才的新疆省政府系統並存的，是蘇聯駐迪化（烏魯木齊）總領事館控制下的蘇聯勢力系統：蘇聯軍事顧問、紅軍部隊；政府各部門出任首長的共產國際中國籍人員、擔任顧問的蘇聯人；反帝會以及主掌宣傳部門的共產國際中國籍人員；在各部門擔任要職的中共黨員。盛世才統治新疆十年中的前八年（1934-1942），這種雙重結構一直存在（頁 99）。作者認為，盛世才這種親蘇政策與他的民族政策之間存在著互動關係。在這種雙重結構中，蘇聯和盛世才都強化了與穆斯林民族領袖的關係，這就埋下了日後蘇聯支持新疆穆斯林民族暴動的伏筆。盛世才和蘇聯反目後，蘇聯放棄了支持漢族統治者的政策，改為支持突厥系伊斯蘭民族的獨立運動（頁 113）。

《東突運動》一書對於喀什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歷史著墨不多（只有三頁），它主要分析的是 1944-1949 年在伊犁、塔城和阿山發生的第二次東突運動。因此，該書的第三、四兩章只能視為對第二次東突運動爆發背景的分析。

1942 年是蘇聯「衛國戰爭」中最困難的年頭。見風轉舵的盛世才由親蘇親共轉而反蘇反共，投向國民黨政權。1944 年伊犁地區首府伊寧發生了反國民黨政府的武裝暴動，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史稱「伊寧事變」。《東

突運動》一書的第五、六、七章，重點分析了這一歷史事件的起因、經過，以及這次東突運動的性質及其內部權力結構特徵。

第五章用大量材料敘述暴動的經過以及蘇聯捲入後，得出結論說，與 1930 年代喀什的東突運動不同的是，1940 年代伊寧的東突運動是「一場由蘇聯支援的中國突厥系伊斯蘭民族居民為推翻中國統治為目標而進行的聖戰」（頁 159）。也就是說，第二次東突運動具有雙重性質：既是在穆斯林宗教上層人士號召下，動員突厥系穆斯林參加的聖戰，又要由親蘇的穆斯林知識分子通過這次運動，實現蘇聯的政治目的。

正是這種雙重性，造成了兩大政治勢力在東突共和國權力結構中共存的局面。這兩大勢力是以伊力汗·吐烈為代表的宗教領袖和突厥系穆斯林民族上層人士的勢力，以及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為代表的親蘇穆斯林知識分子和以蘇聯人為代表的蘇聯勢力（頁 192）。共和國政府的頭面人物都是前者，而後者則控制了有實權的軍事和內務部門。該書的第六章著重分析了這兩大勢力在蘇聯主導下，在共和國政府內權力鬥爭中相互消長的過程。蘇聯的主導是這個東突政權雙重結構得以形成並能夠維持的前提。伊力汗·吐烈這一派人物心裡明白，他們要想打破這個雙重結構，只有面臨完全被驅除的結局（頁 193）。

第七章以「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結合點」為題，分析了蘇聯通過設在伊寧的「一號房子」、「二號房子」，塔城的「伊米爾指揮部」，以及阿山的「白房子」、「藍房子」，指揮民族軍在三線作戰的過程，並探討蘇聯在戰鬥中取得節節勝利的原因，進而得出結論說，「蘇聯對新疆突厥系伊斯蘭民族運動的滲透程度的確令人震驚」。這個共和國的性質、政策乃至最後的命運，都由蘇聯勢力所左右（頁 221）。

該書第八章則分析了在國際大背景下，蘇聯左右東突運動走向的各種因素。該章指出，東突運動不過是遠東政治棋盤上蘇聯的一個棋子而已。這次東突運動的致命傷，就是那些穆斯林上層勢力把獨立的希望寄託在蘇聯身上（頁 253）。

1945 年 9 月，民族軍的進攻在離迪化一百多公里的瑪納斯戛然而止。隨後，東突政權接受蘇聯駐迪化總領事的調停，派阿合買提江為代表，開始與中國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張治中舉行和平談判。

《東突運動》一書認為，此舉意味著東突運動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轉變。該書的第九章和第十章指出，隨著和平談判的進展，東突共和國內部兩大勢力各自使用不同的政治手段，展開了激烈的內部鬥爭。這個鬥爭的過程就是東突運動消亡的過程（頁 286）。

阿巴索夫在伊寧領導成立了「東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組織」。1946 年，阿巴索夫在這個組織的基礎上又秘密成立了帶有無產階級政黨色彩的「東突厥斯坦革命黨」。作者認為，這個政黨的成立，意味著東突運動內部兩大勢力並存的結構徹底瓦解（頁 278）。也就在這個時候，阿合買提江和張治中簽訂了和平協定，雙方共同組織新疆省聯合政府。簽字前夜，東突政府宣布自己改稱「伊寧參議會」，「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政府」也就不復存在了。

該書第十章以「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為題，對東突運動做出總結說，當今一些維吾爾知識分子「仍然在懷念當年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尤其是第二次獨立運動時期的輝煌」。但歷史證明，那「不過是一場虛像」，因為它是依靠外來勢力而起，而又逃不脫「最終又被外來勢力所拋棄的慘淡下場」（頁 316-317）。

《東突運動》一書是在中國大陸之外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東突運動的中文專著。在此之前，有兩部英文專著問世：Linda Benson 的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Armonk: M. E. Sharpe, 1990, 296pp.；以下簡稱《伊犁暴動》）和筆者的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88pp.；以下簡稱《伊寧事變》）。此外還有 Andrew D. W. Forbes 的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376pp.）。這本書雖是新疆現代史的「通史」，

不是研究東突運動的專著，但此書對只有八十五天壽命的 1930 年代「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歷史論述，極具價值。

《伊寧事變》認為，蘇聯在第二次東突運動背後起著主導作用，整個運動進程都是著眼於蘇聯在遠東的整體利益。《伊犁暴動》一書則強調該事件爆發原因在中國內部，也就是國民政府錯誤的民族政策所導致的結果。

從分析蘇聯在 1940 年代東突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來看，《東突運動》一書與《伊寧事變》的結論不謀而合。兩者只是從不同的框架得出了這個相同或相似的結論：前者著重於新疆社會政治結構的雙重性所起的作用，而後者則把事件放到二戰後期形成的雅爾達體系大環境中進行考察。應該指出的是，《東突運動》的作者極可能是在不知曉《伊寧事變》的情況下得出自己的結論的，因為該書並未引用，甚至沒有提及《伊寧事變》。

《東突運動》使用了大量的維吾爾文、日文和中文的材料，遺憾的是英文材料使用極少。《伊寧事變》一書書目中提及的美國駐迪化和重慶外交官發給華盛頓的數百封電報，足以支持《東突運動》一書的結論。《東突運動》的作者在書中還編製了大量圖表，說明當時新疆社會政治的雙重性，大大方便了讀者瞭解事件的性質。但圖表之下並未準確說明圖表所用材料的原始出處，這就影響了該書的學術價值。例如，頁 186 的〈圖 6-3 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內部兩大政治勢力共存的構造圖〉，圖下的來源說明是「筆者依據『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各種文件製成」。

以上著述中，《伊寧事變》使用的俄文材料較多，但均是二手材料，因限於蘇聯檔案當時尚未公開。能證明蘇聯在東突運動中所起作用、確鑿無誤的證據，非蘇聯原始檔案莫屬。蘇聯檔案開放已經有些年頭了，這些年來已有些學者利用這些檔案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例如，2012 年 9 月刊登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22 卷第 3 期的〈從哈共（布）中央的報告看蘇聯對中國新疆政策的變化〉一文，利用解密的蘇聯檔案——1947 年 6 月哈薩克共和國共產黨發給莫斯科的報告——分析了新疆聯合政府成立後，在新疆形勢向不利於蘇聯

方向發展時（阿山地區哈薩克在烏斯滿帶領下反叛伊寧），蘇聯轉而加強對新疆穆斯林民族支持的力度。該計畫未曾實施，因為後來三區官員不辭而別，從迪化撤回伊寧，而國民黨政府又困於內戰，無力對伊寧方面採取強硬措施。

相信不久將有中外學者能利用蘇聯原始檔案，以新的研究成果驗證《東突運動》與《伊寧事變》兩書的結論。